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当午耕耘集

齐清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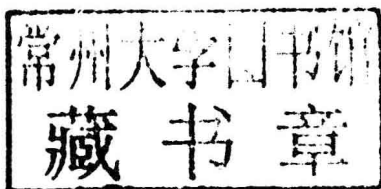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当午耕耘集

齐清顺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午耕耘集 / 齐清顺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7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ISBN 978-7-228-14356-6

I. ①当 … II. ①齐 … III. ①新疆 - 地方史 - 清代 - 文集 IV. ①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3099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整体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1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483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50.00 元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编委会

一、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福环

副主任委员：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委员：苗普生 张运德 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 库兰·尼合买提
刘仲康 潘志平 董兆武 田卫疆 齐清顺 王 宁 马品彦
郭泰山 刘国防 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 阿班·毛力提汗
米娜娃·阿不都热依木 白 莉 艾比布拉·阿不都沙拉木
李晓霞 木拉提·黑那亚提 李树辉 宋建华 柴 林

主 编：吴福环

二、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李行力

成 员：王 磊 古丽巴哈尔

序

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美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于1981年,30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疆改革开放及社会稳定大局,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系统精专的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开始进行农牧区调查和有关新疆历史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足迹踏遍天山南北、绿洲草原,身影留在农家小院、牧民毡房、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兵团连队、军营哨所,查阅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图书档案,撰写调研报告,发表学术论著,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以及新疆周邻的中亚等国际问题。几十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几十年“冷板凳”,几十年“爬格子”;身居陋室,

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春蚕吐丝,似蜡烛燃烧。这些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代专家学者出版了数百上千部著作、数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赤诚。他们是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人。200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支持和资助院里具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教授)的专家学者每人出版一部文集,先从离退休专家学者做起,逐步扩展至在职者,每人从自己毕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选数十篇代表作,结集成书,经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付梓出版。每一部文集都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晶和智慧的阐发。阅读这一部部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每位作者的学术历程和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新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这套文库的出版,是多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是奉献给社会的一批精神财富。同时,这些成果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一套极有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衷心祝贺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并祝愿新疆社会科学院不断推出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0年10月10日

自序

前几年,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决定给本院有研究员职称的科研人员,每人出一本文集。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我便把在新疆工作几十年以来从事新疆历史、民族等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汇集起来,编成一本文集,取名为《当午耕耘集》,交给院里有关部门领导,准备出版。根据惯例,在文集的前面要有一个“自序”。我便把为庆贺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环境、机遇与耕耘——我的清代新疆史研究之路》,稍作修改,放在这里,权当“自序”,以飨读者。从这篇“自序”里,读者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我从事清代新疆史的研究之路,而且可以大致了解我在新疆社会科学院的整个工作情况,以及其他的一些情况。

(一)

今年是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我国古代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说:“三十而立”,是说一个人到了30岁,就应该能独立担当大任了。在1981年3月4日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大会上,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韩劲草代表自治区党委在讲话中要求:社会科学院各族科研人员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要大力加强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积极为自治区的“四化建设”服务,为加强民族团结服务,当好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有力助手。30年来新疆社会科学的成长经历和发展壮大证明,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没有辜负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期望,没有辜负全疆人民的重托。在我国改革开放中诞生、在我国科学的春天里生长的新疆社会科学院,今天不仅已经是新疆唯一的学科比较齐全、水平居于前列、各族专家荟萃、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而且已经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和谐的重要智囊团和思想库,在新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于197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返回新疆,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工作。1981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分为新疆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和宗教研究所,我被分在历史研究所工作。1986年,我被调到本院的新疆社会科学杂志社的《西域研究》编辑部工作,先后担任副主编、主编。2001年12月,我又被调到本院的民族研究所工作,任所长。30余年来,我共出版发表著作、论文300余万字。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参加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及自治区级的多项课题项目。主持或参加写作的多项著作与论文获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1998年获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三等)称号。1999年9月评聘为研究员。2008年12月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并获“2008年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下面就我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工作学习的30年,谈点体会,算是对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30周年的纪念。

(二)

在中学时代,数理化一直是我的强项,各科考试成绩在班里往往是名列前茅,而文科类考试的成绩最多只能位列中等。在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重理轻文”的年代里,我也一直把能进入理工科大学学习作为自己人生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紧接着几年的“上山下乡”,使我与当时其他同龄人一样,不得不放弃进大学继续学习的愿望,而进入“广阔的天地”里接受“再教育”,大学之门似乎离我有点远了。当时,我父母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四师70团工作,1969年2月我开始接受“再教育”的地方也是这个团场。这时候,“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大学早已“停课闹革命”。再加上在农场的整天劳动和不断的“斗、批、改”革命运动,使我感到离家虽然近了,但离大学的门似乎又远了。1971年春,我被调到农四师通讯连(在伊宁市)工作。这次工作调动,离我原中学读书的母校——农四师子女学校(亦在伊宁市)近了,但繁忙的工作和不明朗的政治形势,似乎使我感到离大学的门更远了。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2年春,“文化大革命”已进入

后期,全国高校恢复招生,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当年4月的一天,连长派人把我从野外工地叫回连部,通知我准备上大学。当时农四师一共不到10个名额,幸运之神如何会降临到我的头上,至今我也不太清楚,大概与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学习基础较好有关吧。反正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农四师机关开大会送行,师领导亲自接见,还派车派人从伊犁送到乌鲁木齐火车站,车票食宿全部免费。但对我来说,也有一点遗憾。按照分配,我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我与带队的领导说,能否与同行的一个人调换一下,让我改去一个理工科的大学(那个人喜欢文科),但遭到拒绝。在那个“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年代,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志向和喜好的。这样,我便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报到学习。没想到,这次和历史学科的被动结缘,竟成了我今后一生的工作和事业。

在南京大学历史系3年多的学习生活中,学校里良好的办学生活条件(吃、住全免费,每月还发几元零用钱)、浓厚的学术空气和诸位老师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和难忘。我们这个班一共有25位“学员”(当时不称“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基层和部队,学历差别较大,有高中已毕业的所谓“老三届”,也有小学刚毕业的“小青年”。班里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我被安排在中国史专业学习。我们班的辅导员是张宪文,当时比我大十余岁,正精力充沛,工作也十分认真负责(今已是国内外著名的中华民国史专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著名的专家教授,例如当时或后来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的韩儒林、茅家琦等,都给我们上过课。1975年7月三年多学习结束后,根据当时毕业生要“哪来哪去”的分配原则,我与新疆同去的“工农兵学员”一样,又返回了新疆。按说,我应该仍回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四师工作。但是,正是在我们学习的期间,生产建设兵团被解散,我们的工作分配由自治区统一进行,这样也就不一定非要仍回兵团不可了。经过努力,根据我所学的专业,被分配到当时属自治区科委代管的新疆民族研究所(当时的民族研究所主要从事新疆地方史研究)工作,并被安排到近现代史研究室,专门从事新疆近现代史研究。这样,我又不自觉地与新疆历史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三)

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是新疆唯一的专门研究新疆地

方史、民族史的机构,设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大院内,由自治区科委代管,负责人是王如刚。所内有20余人,分为古代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室、翻译室、资料室等,主要从事研究撰写的项目有《新疆简史》、《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准噶尔史略》等。我到所内后被安排在近代史研究室工作。第二年,领导安排我参加《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一书的编撰工作。此书是由北京的人民出版社约稿、参照《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一书,为配合当时国家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斗争需要而编撰的一本书。全书以历史资料为主、按问题编撰,集中反映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帝国主义对新疆侵略的历史”(1987年出版,后获自治区1990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承担了“中国军民反对外来侵略、收复新疆斗争的胜利”、“新疆建省”、“帕米尔问题”等三章的编写,约10万字。为了编写这10万字的资料,在几年中,我不仅翻阅了所内藏有的大量有关书籍,而且抄写了不下50—60万字的资料(当是还没有复印机、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一切都要手工抄写。但此法看似有些笨,却印象极深,抄写一遍胜看十遍,将会终生难忘)。同时,这三章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属新疆近代史的范畴,但是,其实也属于清代新疆史的一部分。这项工作的完成,使我受益颇大,不仅为后来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而且开拓了视野,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这时,时间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领导安排我校对《清实录新疆历史资料辑录》(共十二册)。这些数百万字的宝贵资料,是郭平梁、纪大椿等民族所老一辈专家辛辛苦苦地从《大清历朝实录》中摘抄下来的,所里准备内部铅印成书。作为清代新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通过校对这部书,我接触到了更多清代新疆史方面的资料,深感这才是我今后大有用武之地的研究领域。我便从新疆近代史(也可称“晚清新疆史”)研究领域向上延伸,逐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清代新疆史的研究中去。为此,我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中的全部资料,按问题、时间顺序进行了剪贴编排。为了尽快完成这一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很少过节假日。剪刀加浆糊的工作虽然简单枯燥,但正是对这数百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分类,使我大开了眼界,发现了许多前人没研究过的问题,对清代新疆史有了不少自己独到的认识。后来我撰写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清代新疆史研究的论文,大多是在这个基础上写作完成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民族所原领导

对我的这两项工作安排,使我走上了清代新疆史研究的不悔之路。

在以后的20余年中,我从新疆社会科学院(1981年成立)的历史研究所调到杂志社的《西域研究》编辑部工作,后又调到民族研究所工作。工作任务虽几经变动,但对清代新疆史的研究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西域研究》编辑部工作时期,特别是在担任《西域研究》的主编后,为了把《西域研究》办成新疆一流并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杂志,组稿、审稿、校稿等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2001年底担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后,为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完成院里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又转而去学习有关民族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并开展一些社会调查和撰写有关民族研究方面的文章。本文集中的一些关于新疆民族问题的文章,就是在这时期撰写的。但是,在这时期,我也没有完全放弃对清代新疆史的研究。除了完成本身的日常工作和上级各部门领导布置的一些写作任务外,我把其他时间,更多的是节假日和业余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对清代新疆史的研究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内,除完成其他各种研究任务和行政工作外,还撰写发表了不少与清代新疆史有关的论文和文章。其中主要论文已经收入我个人的《清代新疆研究文集》一书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同时,在这一时期,还出版了由我主持并担任主要写作任务的《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另外,在这一时期,我还参加了《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走向21世纪的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吐鲁番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历史的辉煌——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50周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疆通志·民族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图说新疆历史·清朝时期的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书有关章节的撰写工作。另外,由我单独撰写完成的《1759—1949年: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一书已出版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

当前,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苏两国权益博弈下的中国新疆》已经撰写完毕(32万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疆通史·清代卷》上册,也正在加紧撰写之中。

(四)

当今有一句常听到的话“祝您万事如意”，其实人的一生中，凡事都如意的并不多。现在回想起来，我走过的这段新疆历史、民族研究之路，感到人生在很多时候的选择，自己是无奈的，特别是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不管是到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劳动锻炼，还是进入南京大学的学习深造；不管是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从事新疆近代史研究，还是到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所、杂志社、民族所从事各种研究、编辑和领导工作，这些重大人生转折的选择，大多都不是我个人决定的，而是由于组织的需要和安排。机遇对一个人来说，是可得而不可求的，但机遇却又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安排的。

如前所述，我与历史研究，特别是与清代新疆史和新疆民族问题研究的结缘，虽然大都不是我事先安排和选择的，但是说事先一点基础和准备都没有，也不符合实际。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历史给你的每一次机遇，即使这种机遇并不是你原来所希望的或你的原有理想。但是，当机遇把你安排到某一工作岗位上时，你就应该尽量把它做好，做出成绩来。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岗位，只要你相信一句话，“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我出生在河南农村，又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接受再教育”数年，不仅亲眼看到过，而且亲身尝试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因为农民都深知，躺在树荫下，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只有辛勤地劳动、努力地耕耘，地里才能长出粮食，才能获得丰收。本文集取名为《当午耕耘集》，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些不经过长期努力，妄图一朝成名成家的人；那些整天贪图享受，妄图一天发财致富的人，应该早点离开新疆社会科学院另谋发展，因为从事历史研究（包括从事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准备，而且还要有耐得住比较长期贫寒的决心，以及刻苦钻研的毅力。我从事新疆历史，特别是从事清代新疆史和新疆民族问题研究之所以能有一点成绩，环境和机遇固然重要，但努力和耕耘，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我这样说可能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但它确实是我的几句肺腑之言。

这里，我还要强调说明的是，在我从事新疆历史、民族研究工作的36年中，其中30年是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度过的。因此，我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

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与新疆社会科学院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新疆社会科学院坚强的政治领导,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学术环境,可靠的物资保证,融洽的同事关系,是使我能够健康成长和取得今天某些成绩的基本条件。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历任主要领导,本身大都是当时新疆颇有名气并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有的还是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著名专家学者。例如第一任院长谷苞,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是副教授,在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的长期工作中,他对新疆的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享誉国内外。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的所长,也大多是本学科的带头人或著名专家学者。同时,在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各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造诣较高、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结合新疆的地区民族特点,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刻苦努力所写出发表的许多研究成果,不仅为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国内外的学术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工作的30年,使我深深地感到:新疆社会科学院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少有而难得的一块宝地,是有志于从事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们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而我就是在这里成长、成材的受益者之一。

另外,我还想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和取得的这些成就中,与原民族研究所以及后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所、杂志社、民族所等一些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也是分不开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老师如:郭平梁、徐伯夫、郭蕴华、纪大椿、蔡颖、马国荣、殷晴、陈超,等等。他们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在生活上,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上给我的关心和帮助,使我终身受益和永远难忘。

总之,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一个人能工作的时间是很有有限的,一个人的力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一个人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和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点成绩和事业非常不容易。在你工作生活的短短几十年中,外部环境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无数的机遇也在从你身边悄悄地走过。这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适应环境,抓住机遇,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和不懈努力,才能做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才能在对人类社会发发展进步作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希望目标。

(五)

最后,还要说明三点:

1. 在这本文集编撰之前,我已经出版了一本《清代新疆研究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里面收录了我清代新疆史研究方面的大部分论文。因此,在编撰这个文集时,我有意地扩大了收录的范围。这部《当午耕耘集》收录的文章中,除有关清代新疆史研究方面的一部分论文与前一个文集相同外,其他有关对新疆历史文化宏观论述的文章以及对新疆近代史、新疆民族问题研究的文章,都是前一个文集所没有收录的。因此,这本文集,从总体来说,更能反映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在新疆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全貌。

2. 本文集中的文章,都在相关专业学术杂志上已经公开发表过。这次集结出版,为了保持原貌和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学术水平,除个别文章做了一些小的改动外,绝大部分是原文照排。

3. 由于本文集字数的限制,还有一些文章没有收入。特别是一些我认为花了比较多的工夫撰写的、在学术界有较好影响的清代新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没能收入,为此感到有一点遗憾。但是,院里对本文集的数字有规定,自己也不好违反,这点遗憾只能以后再设法弥补了。

写于新疆社会科学院

2011年2月

目 录

序	(1)
自序	(1)
我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的历史进程	(1)
新疆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	(12)
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特点及其重要影响	(29)
西域、新疆与新疆省	(44)
清朝与准噶尔部百年关系史略(1644—1744 年)	(54)
18 世纪前半期清朝与准噶尔对吐鲁番地区的争夺	(77)
清朝“平准”战争战略方针的转变及其影响	(87)
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与开发	(101)
清朝加强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举措	(107)
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	(124)
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	(135)
清代新疆的官铺和对外贸易政策	(153)
清朝对新疆沿边“归附”各部的“羁縻”政策及其检讨	(167)
论清道光时期新疆解决人口与耕地矛盾的重大措施	(183)
设省前后清朝对新疆主要民族分布格局的调整	(200)
清代新疆遣犯研究	(216)
清代新疆“废员”研究	(236)
清代新疆的关羽崇拜	(251)
论左宗棠抗俄十年的思想转变	(260)

刘锦棠在新疆	(271)
论清末新疆“新政”	
——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	(283)
论近代新疆军队发展的历史进程	(294)
论近代新疆对苏(俄)政策的基本方针	(305)
20 世纪前半叶苏联出兵新疆述论	(317)
新疆“三区革命”的称呼考察	
——兼谈对有关问题的断想	(333)
论“三区革命”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处理新疆问题之对策	
——读唐纵“处理新疆问题之意见具申”	(349)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在新疆的活动及其贡献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	(363)
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中涉及新疆的几个问题	(377)
新形势下新疆民族研究工作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397)
论新形势下新疆民族自治地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411)
合理引导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国家意识,促进新疆的稳定和发展 ...	(422)
新疆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37)
永久的纪念和取之不竭的财富	
——在《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出版发行仪式上的发言	(449)
研究成果目录	(454)
后记	(459)

我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 政策的历史进程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古代,新疆及其周围地区,统称西域。早在公元前 101 年,西汉就在西域设立了地方官吏,管理屯田事务。公元前 60 年,西汉又设立西域都护府,统管整个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这标志着新疆从那时起已正式成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汉代以来,特别是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十分重视并实施对西域地区的管理。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大肆侵占和掠夺我国领土,英、俄势力乘机入侵了新疆地区。1877 年清朝政府抵御外部势力、收复新疆以后,1884 年建立了新疆省。从总的历史进程看,中央政府一直对新疆行使着管辖权。为了维护这一地区的政局稳定,保卫中国西北边防的安全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代中央王朝都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各种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了許多别具时代、地区特色的政策。例如:和亲修好政策、质子控制政策、筑城屯兵政策、平叛安抚政策、屯垦就粮政策、移民实边政策、轻徭薄赋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羁縻拢络政策、多元制约政策、定期朝贡政策、贸易监管政策、建驿通邮政策、设卡巡边政策,等等。这些政策虽然随着历史发展和情况变化,其名称、内容、作用等都不尽相同,但综观新疆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政府治理新疆政策的发展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随着我国,特别是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不断增多,中央王朝政府治理新疆的各项政策也在逐渐地加强、逐渐地完善、逐渐地发展,并最终与内地趋于一致。这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治理地域逐渐明确固定

众所周知,我国疆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多次变化,一直